

关于我国思想库建设的思考

李 光

改革之年的中国又迎来了新春。怎样使我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如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这是每一个具有责任心、紧迫感的炎黄子孙所关心的问题。为了振兴中华,促进我国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现代思想库对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意义,并且从速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思想库体系。

思想库(Think Tank)也称之“智囊团”、“脑库”等等,它是现代咨询机构的形象化代称。作为有效的咨询服务机构,思想库主要为现代社会的决策科学化服务。人类社会的决策活动源远流长,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追溯历史,决策与“咨询”、“智囊”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南宋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对东汉王逸哀悼屈原之佳句“纷载驱兮高驰,将咨询兮皇羲”诠释时,云“皇羲,羲皇也。咨,问。询,谋”。其意为屈原离世远去,将与发明阴爻、阳爻的八卦祖师伏羲谋议。在《汉书·晁错传注》中,唐朝颜师古将“智囊”解释为“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究其实质而言,决策主要是由个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力所决定,表现为皇帝“受命于天,朕即国家”,违圣旨者问罪。即使是小小的七品知县也可自称“父母官”,亦有为民作主之说。诚然,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身边也不乏“谋士”、“智士”、“策士”、“咨议”、“参议”等人,但这些决策者的“外脑”处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中,不仅易受专制政治以及决策者个人素质的制约,而且也受自身素质的制约,其作用的发挥是非常有限的。

⑫⑬⑭⑮ 参见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改造》3卷6号。

⑯⑰⑱⑲⑳ 《李达文集》第1卷,第62、67、63、64、65、66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李达文集》第1卷,第68、69、203、232、47、62、52、52、52、53、72、56、72、72—73、73、74、102、83页。

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4页。

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㊲④⑤⑥⑦⑧⑨ 《李达文集》第1卷,第88、90、88、87、88、80页。

㊳ 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载《共产党》5号。

㊴ 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载《新青年》6卷5号。

㊵ 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通信),载《新青年》9卷4号。

㊶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李达文集》第1卷,第81、82、84、84、89、90、49、50、51、78、78、79页。

㊳ 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载《进化》第2号。

㊴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02页。

人类历史长河的流逝,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事实,即个人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来说减弱了。决策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也迫使人们反思并意识到,仅仅依靠个人的知识、秉赋和才智,要取得成功的决策,已远远不够了。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由于人类科学认识的飞跃发展,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且社会环境日趋复杂,人们对决策科学化的追求形成了时代潮流,亦出现了个人决策向群体决策、定性决策向定量决策、单项目标决策向多目标综合决策、决策功能由决策者向“外脑”外延的发展趋势。与这种发展趋势相适应,决策者或决策群体的“外脑”,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现代化思想库应运而生。从我国历史上决策者智囊人数增长看,先秦时代的决策者所招揽的智囊人物仅3~4名;秦汉至唐宋时代的决策者所招揽的智囊人物为6~7名;元初、明初和清初的决策者,其智囊人物已有10人;而晚清载湉作为决策者时,已有30多名智囊人物为之运筹谋划^①。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由于人们对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集中管理和分层负责的认识以及实践,服务于不同层次决策的智囊人物大大增加。与传统的“外脑”相比较,现代思想库有着质的变化。它强调其知识结构、智能结构;强调其调研咨询的客观性、超脱性、综合性、适应性和动态性;强调其调研咨询方法的科学性和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强调其组织形式上的自我调节和完善。现代思想库也要求决策者或决策群体具有较好的素质,要求社会提供较好的环境。从系统论的基本观点看,现代思想库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其整体功能远非昔日的“智囊”和“外脑”所能比拟,乃致于人们认为思想库已成为“影响现代决策者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现代领导体制和社会的各种决策过程中,思想库确实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功能已引起国际上的广泛重视,导致了世界性的“思想库热”,并正在形成独立的知识产业。

目前,世界上的思想库形形色色,不胜枚举,亦有竞相发展之势。特别是那些主要为宏观决策提供服务,且硕果累累的高层次、高水平的思想库,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分析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一些思想库,我们可以对现代思想库有一粗略的认识。

从现代思想库的规模来看,按其研究实力可归纳为三类,且有相应的组织形式。第一类“大型”思想库以美国兰德公司、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为代表,具有“自主型”组织形式。这类思想库实力雄厚,综合性强,人才齐全,职员多达数百名乃至上千名,一般不需要从社会上聘请更多的专家学者。第二类“中型”思想库以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为代表,具有“主从型”组织形式。这类思想库的研究实力不如前一类,职员数十名上百名不等,其调研咨询以自己为主,但要借助社会上的力量。第三类“小型”思想库以日本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为代表,具有“协调型”组织形式。这类思想库的研究实力无法与前两类相比,职员数名上十名,其研究力量薄弱或根本不设专职研究人员,主要是争取和借助于社会上的研究力量,自身只起到组织、协调和辅助作用。从笔者看到的材料分析,国外以“中型”、“小型”思想库为多见,但也不乏“大型”或“超级”思想库,其特点和作用非常明显。不同规模和组织形式的思想库之互补,使咨询服务范围相当广泛,构成了现代思想库体系,从而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决策之需要。

从现代思想库的隶属关系来看,可谓之多样化,主要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官方”性质的思想库,如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中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等等。第二类是“民间”性质的思想库,如美国兰德公司、巴特尔研究所、阿瑟·利特尔科技咨询公司(ADL)、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日立综合计划研究所、中国科协系统科技咨

询服务中心所属的民办咨询机构等等。值得指出的是,“民间”性质并不影响这类思想库与官方的密切联系和多边合作。第三类是隶属于大学的思想库,如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政策系、瑞典隆德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决策管理科学研究所等等。由于国外的大学有国立、公立和私立之分,且大学有教书育人之天职,因而隶属于大学的思想库有其特殊性。从笔者看到的材料分析,这三种性质的思想库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比重不同,如日本思想库多为财团法人,大学中的思想库实属少见。此外,还有一些思想库具有双重隶属关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亦如此,它是根据日本国会通过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而设立的半官半民组织。

从现代思想库的咨询服务范围来看,有“专业化”和“综合化”服务之分,亦有“软”、“硬”和“软、硬兼施”服务之别。纵观思想库的咨询服务,经历了分化和综合的统一。当前,提供“软、硬兼施”的综合服务已是一种明显趋势。据统计,英国管理咨询协会1968年为社会提供咨询服务646项,其中为零售商业企业提供189项,为研究机构提供133项,为保险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132项,为化工企业提供131项,为冶金工业提供61项,由此可见其服务范围之广。ADL创建于1876年,最初以纯粹提供“硬”技术服务为主旨,以后逐渐形成“软、硬兼施”的多功能科技咨询思想库。今天的ADL,每年约承担5,000个项目,完成2,000多项咨询课题,咨询服务对象不限于美国,而遍及世界上50多个国家或地区,其咨询服务之广堪称罕见。如美国铁路系统的计算机模拟、东芝公司新建汽车厂的可行性研究、沙特阿拉伯的城市发展规划、芬兰某建筑公司的改组方案等等,该公司甚至自嘲:几乎没有什么事与ADL咨询服务的业务无关。兰德公司的咨询服务范围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的许多领域,其咨询服务的兼容性颇强。有人诙谐地比喻说:现代思想库咨询服务范围之广,就象跨国公司“从方便面条到导弹”全都经销一样。不仅如此,思想库的咨询服务范围仍在不断拓展,思想库之间大跨度的横向联系加速了这一过程。

从现代思想库的特色来看,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特色,是任何一个思想库从一开始就努力追求的目标。按照笔者之拙见,思想库的特色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其组织、管理方面的特色;一类是其咨询服务主要范围方面的特色。显然,前者是实现后者的重要步骤,若无有效的、科学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就很难有体现在咨询项目成功率、高质量、高效益上的特色。日本综合研究所在国内有“诊断社会机能的医生”之美称,其组织形式和管理都独具一格,颇有特色。以该所职员的职务而言,以自己申报为准,其前提是有利于调研咨询工作,且职务不与薪金挂钩。因此,职员往往具有双重或多重职称,这种灵活的“相对职称”使职员既可以对民间自称调查部长,又能向官方认定自己是主任研究员,从职称上亦反映出“一专多能”^②。ADL赋予课题组长极大的权利,一旦明确课题并选任组长,组长亦有权招兵点将,可请公司里的任何人参加工作,即使是公司主要负责人亦不例外。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皆以有关防卫方面的调研著称于世;日本社会工程研究所以“联结政治、行政、经营、学术等各界的‘行动知识集团’”自居;日兴研究中心以预测日本产业未来发展为特色……。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被人们称之为政府的“经济参谋总部”,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相当大,以致于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指出:制定经济政策要听经济同友会的意见,经济政策的实施则要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看法。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对军事问题只限于战略等“软科学”研究,而不承担兵器方面的“硬”

研究。大平正芳组阁后，该所理事长猪木正道被聘为“综合安全保障研究组”主席，直接为首相提供防卫战略方面的咨询。从现代思想库的兴起和发展来看，思想库的特色是在竞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形成特色不易，保持特色更难。

从现代思想库的研究方式来看，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强调跨学科领域的协作调研。这种研究方式既是科学知识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解决日益复杂的科学、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客观需要。现代社会存在着众多令人棘手的问题，往往非常复杂且具有跨学科领域的性质，需要人们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而决非某一学科领域所能圆满解决的。从思想库为决策科学化服务的功能看，它所提供的调研结果应该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其得到调研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科学的、有效的，能够使人们事半功倍。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合乎真理的。”^③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现新的科学综合化趋势以后，思想库顺应了这种以跨学科领域探索为特征的历史潮流，特别重视其知识结构、智能结构、跨学科领域研究方法以及多学科领域协同的组织。象前述“自主型”和“主从型”思想库，都充分考虑并力图形成结构优化、适应性强的调研队伍，以适应决策科学化以及扩大咨询服务范围的需要。“协调型”思想库也是基于以上考虑而形成“小实体，大网络”。日本综合研究所以“诊断日本社会病症”而著名，它拥有25名职员，其中研究员16名，他们分别专于社会学、经济学、经营学、管理学、流通学、环境生态学、文化人类学、观光学等等，从不同角度探索日本社会之病症。该所自1970年8月31日问世后，对日本公害问题、核电站安全问题以及其它社会问题进行了调研。尤其是“关于居民反对运动和与居民协商”的调研，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重视。为了便于获取信息、研究和国际交流，日本亚州经济研究所的调研队伍中，配有懂英、汉、俄、德、法等16种语言的各种专业人才。ADL更是人才济济，实力相当雄厚，使用的语言竟有39种之多。

现代思想库是适应现代科学、经济、社会活动迅速发展的产物，它是决策科学化、决策民主化的一种有效形式。思想库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显然与其结构、组织和管理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思想库促进决策科学化、决策民主化的重要作用，并紧密地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建设和完善我国的思想库及其体系。

尽管人类社会的决策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只是在迅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才充分意识到决策的重要性。特别是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重大决策，大则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兴衰，事关历史进程以及整个民族的命运、前途之宏旨；小则影响教育、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发展速度，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质量和改善。古今中外，有关重大决策成败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既有名垂青史的决策成功案例，也不乏“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决策失误。严酷的事实表明，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决策的失误。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作出了许多成功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在短时间内改变了神州大地的面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瞩目。但是，由于我们以往发展硬科学、软科学有所偏颇，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导致了软科学落后于硬科学，并屡屡出现决策的失误，酿成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带来了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某些差距。1985年，我国社会生产总值人均不足300美元，在全世界126个国家中处于第108位，即倒数19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决策观念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大生产、大科学、大经济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小生产、自然经济的决策经验。正如日本学者三隅所说：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过去可以用在乡间小路上骑自行车来形容，现在却是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了，但有些决策者尚未来得及领取驾驰执照。这种状况不彻

底改变,将继续酿就决策失误的苦酒,严重地制约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顺应决策科学化的历史潮流,顺者昌,滞者衰,逆者亡。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建设和完善不同层次的思想库及其体系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怎样建设和完善我国思想库及其体系呢?笔者以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形成多层次、高效率、高效益、具有特色的思想库及其体系,促进决策科学化,促进我国科学、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切实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将这项工作与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具体地说,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国外思想库的形成发展看,通常是由于不同利益的需要自由发展起来的,往往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彼此间竞争激烈,矛盾重重,亦不乏偏见和种种弊病。此外,国外通常是先形成“思想库热”,在有一定热度后,为发挥思想库的群体功能,提高其效率和效益,再设立思想库的管理、协调机构。从日本思想库的发展简史来看,以1965年4月1日诞生的NRI为代表,各种思想库犹如雨后春笋,导致了七十年代席卷日本列岛的“思想库热”。直到1974年3月25日才设立负责思想库管理、协调的NIRA,翌年又设立“思想库协议会”。笔者以为,我们无需步别人的后尘,亦步亦趋地发展思想库。为了避免单方面追求思想库的数量和热度,避免蜂拥而上,低水平重复,步入形式主义之歧途,我们必须紧密联系中国的国情,创造良好的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和完善思想库及其体系。因此,可考虑先设立思想库的管理、协调和促进机构。这种机构的建设至少应该与思想库及其体系的建设同步进行。这种机构的功能主要是为政府拟订有关思想库的政策、法规、总体规划,扶植地方思想库,并对其进行协调和分层管理。除自己开展有关方面的调研外,这种机构更重要地是从宏观上统筹考虑,根据国家的需要拟订适当的调研课题,组织、委托其他思想库来完成。如NIRA的研究课题都是日本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协调功能,与其他思想库共同完成。从NIRA选定的1986年—1990年期间政策性研究课题来看,分为10个大的方面:1)人类的未来—今后五十年的日本和世界;2)九十年代的日本;3)国际关系的发展及其课题;4)世界经济的活力与经济秩序;5)新产业社会的经济政策;6)政府的作用和各种制度的改革;7)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及其政策;8)国民生活的变化及其政策;9)大城市问题及其政策;10)关于搞活地区社会的问题。上述每一个方面又由若干子课题构成,以“九十年代的日本”为例,它包括22个子课题,涉及面广。显而易见,这远非NIRA自身的研究力量所能完成。

二、我国思想库及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工作,应该围绕解决我国各种现实问题和潜在问题而展开。毛泽东说过:“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④美国管理学家C·H·刻普勒、B·B·泰柯认为问题是“应有现象”和“实际现象”的偏差。在现代社会的决策活动中,问题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大凡决策必须针对特定的问题进行。笔者认为,以解决现实问题和潜在问题作为思想库建设工作的“起点”和“热点”,不仅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而且是切实可行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解决特定的问题(无论是现实问题或是潜在问题)为目的,易于组织跨学科领域的协同调研,将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粘合”在一起,从而加速形成思想库的基本队伍。2)以解决特定的问题为目的,便于展开横向联系和协作攻关,从而加强不同层次思想库之间、思想库与社会之间的广泛联系。3)以特定的问题作为对象,便于进行“软、硬兼施”的咨询服务,从而形成高效率的、综合性的咨询服务网络。4)以特定的问题作为对象,可以分别进行应用研究、理论研究、超前研究和追踪研究,从而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

便调研具有系统性。5) 以特定的问题作为对象,能促进不同思想库之间的竞争和多视角思考,并打破不同部门内、外思想库之间的界限,发挥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6) 以特定的问题作为对象,便于思想库以擅长于解决某些问题(视问题之大小以及难易程度)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从组织形式上自我完善。当前,不同层次的思想库都应该以改革中的各种问题、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以及增收节支问题作为调研的“热点”,在社会实践中加速建设和完善。

三、我国思想库及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重点在于深入发掘现有研究机构、群团组织以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潜能。通过改革的利器使之转轨变形或迸发潜能,焕发青春,逐渐具备思想库的特性,发挥思想库的功能。从我国思想库的规模和组织形式来看,除中央有计划地建立部分综合性、高层次、大型思想库外,在地方应该以“中型”(主从型)、“小型”(协调型)思想库的建设为主,通过有效的管理、协调和大尺度的横向联系,形成“小实体、大网络、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重特色、整体优化”的思想库体系。国外的实践经验表明,高等院校对思想库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因为高等院校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本身拥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库,而且社会上的许多思想库是以其为依托的。如日本思想库多为财团法人,但几乎都是以当地大学为依托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主从型”、“协调型”思想库,其合作伙伴主要来自高等院校。我国拥有众多高等学府,这是建设和完善思想库及其体系的有利条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开发,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新设的思想库必须经过改革的洗礼,不能落于机构设置的传统俗套,要富有时代色彩,具有生命力、竞争力和辐射力。必须严格按照客观条件确定思想库的组织形式、建设规模、发展规划以及推进速度。形同虚设、可以不设的思想库,应该坚决不设或缓设。

四、我国思想库及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科协所属学会的各种咨询服务机构,积极为不同层次的决策科学化服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上海市科协“宝钢工程顾问委员会”提出的“缓中求活”咨询方案,被国家决策者采纳后减少损失上百亿。北京能源学会基于对我国地理位置及能源供需情况的调研,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的建议,这项建议被国家采纳后于1986年5月4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4个月就节约高峰照明用电630,000,000度,可使工业增加产值2,000,000,000元。四川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为五粮液酒厂提供的改址咨询方案,一次就为国家节约投资10,000,000元。湖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该中心所属的铁道学会咨询部两项咨询建议被国家采纳后,为国家增收节支110,000,000元。随着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科技、经济诸方面新政策的出台,特别是“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政策的实施,将进一步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技咨询服务工作将出现新的局面。特别是隶属于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的各学术团体的咨询机构以及科技人员自愿组合的民办咨询机构,经过一年多的改革阵痛和洗礼,势必有新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以往的咨询服务有所偏颇,出现“二多二少”的现象,即“硬”的科技咨询服务多,“软”的科技咨询服务少;专业性咨询服务多,“软、硬兼施”的综合性咨询服务少。因此,我们应该支持科技人员创办以“软”科学技术服务为特色的咨询机构,鼓励他们为社会提供“软、硬兼施”的成套服务。这种作法的意义还在于创造安定团结的民主气氛,形成官方思想库、民办思想库竞争的势态,通过它们的互补,互相砥砺,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促进决策科学化和决策民主化。

五、我国思想库及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应该与其他工作配套进行。尽管思想库对决策科学化和决策民主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从组织形式上建设和完善我国思想库及其体系

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这项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努力使亿万人民群众都关心我们的改革事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中华民族发明创造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贡献才智。只有广大人民群众都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真正以主人翁的身份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才能将决策失误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不断取得增收节支效益，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这就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民主环境，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才能，并从中体现出他们的价值、尊严和人格。思想库的任何工作或任何个人，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仅要为决策科学化提供依据，为既定的方针政策提供技术性服务，而且还应基于科学信念以及对人民的忠诚，提出不同意见和尖锐的批评，以供作为人民公仆的决策者参考。为了使亿万人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国思想库及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应该与其他工作协调起来，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来完成。如，不论是苏联、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都十分重视群众性的发明与合理化建议活动，并视之为增收节支的利器。事实表明，这种活动涉及面广，渗透性强，能够有效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管理质量，减少决策失误，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非常明显。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笔者已有专文论述^{⑤⑥⑦⑧}，在此不作赘言。在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建设和完善我国的思想库及其体系，必将形成中国思想库的特色，并有效地促进决策科学化，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从近年来国外思想库的发展看，其体制和组织形式亦在不断调整、完善，以适应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其不断增长的需要。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既不能闭目塞听，关门造车，也不能重犯“削足适履”的决策错误。为了振兴中华，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推进改革进程，我国应尽快建设和完善思想库及其体系，这确实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

注释：

- ① 卢明明等：《对中国传统智囊的历史考察》（《上海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2期。）
- ② 李光：《日本思想库组织形式浅析》（《科学管理研究》1985年4期。）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8页。
-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796页。
- ⑤ 李光：《美国合理化建议活动的历史与现状》（《科技进步与对策》（1987年4期。）
- ⑥ 李光：《从日本企业合理化建议制度看现代管理的时代特征》（《学习与实践》1986年2期。）
- ⑦ 李光：《苏联发明与合理化建议活动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科学管理研究》1986年3期。）
- ⑧ 李光：《东欧发明与合理化建议活动的现状及其特点》（《科学学研究》1987年2期。）